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1959年第5期(总第182期)目录

1959年5月25日出版

二届人大大会鼓舞着我们胜利前进!	皮漱石 (1)
真理不容抹杀	王其威 (7)
我们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	李维光、胡文耀 (10)
是可忍，孰不可忍!	皮漱石、董文隆、王文成等 (15)
反对借宗教感情为名干涉我国内政	杨士达 (19)
尼赫鲁的讲话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王 达 (23)
我国内政不容干涉	李荫桃 (25)
尼赫鲁不该颠倒黑白	马光普 (26)
欺侮中国人民的时候永远过去了	(28)
全国各地神修人员和教友纷纷集会讨论尼赫鲁讲话	(29)
让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哭泣吧!	赵振声 (34)
河内天主教友集会谴责美、吴集团制造富利惨案	(36)
四川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扩大会结束	(38)
罗马教廷对社会文化和人类知识的壟断与摧残	周健鐘 (40)
揭露梵蒂冈在拉丁美洲的罪恶活动	朱世昌 (41)

事实真相不容歪曲
我国内政不容干涉

月刊 每月25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

訂閱处: 广揚月刊发行課

(天津和平区西宁道9号)

每册1角 半年6角 全年1元2角

(外埠平寄不加邮費 掛号另訂)

二届人大大会 鼓舞着我們胜利前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員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皮漱石
东北教省沈阳总主教区主教

我这次得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认为这也是我天主教界的光荣。

这次政协全国委员会是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时举行的。大会上总结了1958年在各项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制定了1959年继续跃进的宏伟计划。这确是两个跃进大会。

1958年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它给六亿多人民带来了无比的欢乐与兴奋。这一年里我们在各项建设事业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50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了65%。其中工业和手工业的总产值达到了1,17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66%；农业总产值达到了880亿元，比1957年的537亿元增长了64%。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14亿元，比1957年的126亿元增加了70%。1958年一年的工农业产量，不少超过了以前五年的产量。例如1958年比1957年钢增加了573万吨，煤增加了一亿四千万吨，机床增加了22,000台，

粮食增加了3,800亿斤，棉花3,358万担。而1952年到1957年五年中，鋼增加了400万吨，煤增加了6,400万吨，机床增加了14,300台，粮食增加了612亿斤，棉花增加了673万担。一年就走了资本主义七年或卅年的路程。

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正如周总理所說：“是我国人民在社会組織方面的一个伟大的創造。它对于我国社会經濟的发展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推动生产力繼續向前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将来全国农村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

两个大会一致贊同和通过了1959年国民經济計劃草案的报告。这个計劃是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四大指标——鋼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8,000万吨，粮食产量10,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的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建設情况制訂的。从这个計劃中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繼續大跃进的宏伟計劃。首先表現在1959年計劃規定的指标，有不少的产量是成倍的或几倍的增长。例如发电設備，在1958年只有80万千瓦，1959年将生产280万到300万千瓦，增加250%到275%。其次表現在虽然一些計劃里增长的百分数比1958年低，但絕對数却比1958年高。如鋼产量1958年比上年增长107%即增加了573万吨；1959年比1958年計劃增长62%，而增加的絕對数却是692万吨。这就充分說明我国今年的国民經济計劃是更加跃进、更加宏伟的計劃。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不是远景而是日益在望的事实。当然，为完成速度这样高、規模这样大的計劃，是要遇到困难的，但因为我們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領導，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工农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針，有1958年强大的物質技术基础，有能够繼續推动社

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人民公社，有更大的信心和干劲，有更多的經驗和办法，所以只要我們努力，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热烈地希望我天主教的神长教友，和全国人民一道鼓起冲天的干劲，在各个工作崗位上貢獻出自己一切力量，以新的跃进成績来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

4月27日下午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六亿多中国人民的心充滿着喜悅，欢庆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的新的国家领导人員。我对这次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表示衷心拥护。我們知道，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澤东主席多次的建議，通过了决定，同意毛主席不作本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全国人民在去年十二月間，曾根据这个問題进行了充分的討論，經過了詳細的解释，使我們認識到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专做党中央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和路綫的問題，能騰出較多的時間从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工作，而并不妨碍毛主席对于国家工作繼續發揮领导作用。这样做，对国家、对全国人民、对党都更为有利。因此，全国人民都拥护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这个問題的决定。毛澤东主席虽然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但他仍然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英明伟大的領袖。这种决定不是削弱领导，而是更加强了领导。在党和毛主席以及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精誠团結共同努力下，我們定然会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在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會議上，委員們一致同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所通过的关于西藏問題的決議。我們知道西藏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自治必須是在祖国統一的大家庭里，在符合全民和藏族共同的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脫离祖国的“独

立”。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竟长期勾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企图依靠他們的勢力，分裂祖国，实现所謂的“独立”。最近又发动了背叛祖国、残害西藏人民的武装暴乱，这是我国宪法所不能容許的，也是广大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平定西藏叛乱，是我国的内政，別人无权过問。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特别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謊謬地把西藏說成是一个“国家”，把西藏叛乱說成是民族“起义”，誣蔑我平定西藏叛乱为“侵略”，甚至公开叫囂要派“志願軍”到西藏进行干涉，在我駐印度大使館的門前示威，侮辱我伟大領袖毛主席的画象。这种狂妄卑鄙的行为，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損害了中印友誼，破坏了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已經是使人忍无可忍。而印度政府不仅未能制止这种粗暴的言行，反而助长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尼赫魯在4月27日和5月4日先后发表的两篇講演，尤其令人痛心。他居然也把西藏叛乱說成是什么“强烈的民族情緒”，是“西藏爱国情緒的自然流露”。試問，究竟是一小撮反动分子代表西藏民族呢，还是一百一十多万西藏人民代表西藏民族呢？西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坚决要求改革，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才是真正的强烈的民族情緒；西藏人民积极协助人民解放軍，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平息了叛乱，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情緒的自然流露”。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对中国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來說，是天大的喜事，而尼赫魯却把它看成是“悲剧”，并对少数叛乱分子的失敗深表“同情”。那末尼赫魯站在那面說話，不是一目了然嗎？中国人民为了維護祖国的独立尊嚴，严正地駁斥这种不友好的言行，不是理所当然的嗎？而尼赫魯則一面狡辯說“我們一定不想干涉西藏”，至于現在干涉西藏“主要是一种基于感情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另一方面，却一

口咬定說我們“不顧事實真相和禮節，使用了冷戰的言語”。這是多么不講理的說法！試問尼赫魯，印度擴張主義分子支持西藏叛亂，破壞中國統一，反對中國討伐叛匪，這不是干涉中國內政，難道是印度的內政不成？是否披上“人道”的外衣，就可以任意干涉別國的內政呢？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西藏少數反動分子背叛自己的祖國，保持殘酷野蠻的農奴制度，是否可以說成是“人道”呢？難道只許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干涉我國內政，誹謗我們的國家，侮辱我們偉大的領袖，而我們就得乖乖挨着，不能有所表示嗎？我們一說反對的話，就是“不顧禮節使用了冷戰的言語”，難道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對中國的種種攻擊，對中國人民領袖的侮辱，不僅不是冷戰而且都是按照“禮節”行事的嗎？我們鄭重地警告尼赫魯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們；一切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活動，必將遭到失敗，一切欺侮中國人民的言行，必將遭到有力的回擊。

在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大肆叫囂的同時，美帝國主義也把我國討伐國家叛徒、宗教敗類的正義措施說成是“摧毀宗教”，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梵蒂岡則把這次叛亂的根源說成是“基本權利受到損害的人類的天性”。這些無恥謊言，再次暴露了它們一貫利用宗教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醜惡面目。他們的造謠誣蔑，過去和現在都是枉費心機的。西藏的喇嘛寺廟，仍然聳立在我國邊疆的西藏高原上，西藏的僧俗人民仍然和我國各地的宗教信徒一樣自由地過着宗教生活。在我們新中國不僅有佛教，還有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我們天主教，都一律享受信教自由的權利。在政治待遇上一律平等，沒有受到任何歧視。這兩個大會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證。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中信奉什麼教的都有。再說西藏叛亂，絲毫與宗教無關，而且叛

徒們的所作所为，如杀害活佛喇嘛、烧燬搶劫寺庙、奸淫尼姑妇女，都是极端违反宗教的。这就充分說明美帝国主义和梵蒂岡是又一次恶毒地利用宗教企图达到它們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可恥阴谋。这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

我相信，广大的爱国爱教的神长和教友，决不会再受梵蒂岡的欺騙和愚弄。相反地会加强我們反帝爱国的斗志，会使我們坚定地完成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任务。同时我們还一定要和全民一道为完成 1959 年的宏伟計劃，为迅速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貢獻出所有的力量。



天主教主教、神父、教友 8 人

出席全国人代、政协会議

中国天主教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會議的代表，有李維光主教和童少生、胡文耀教友。李維光、胡文耀代表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會議的委員有：皮漱石总主教、王文成、

董文隆主教和张家树神父、楊士达教友，他們并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张士琅代主教因病請假未出席这次會議。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席楊士达教友当选为政协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員。

西藏少数叛国賊勾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发动的武装叛乱，已經基本上平息了。西藏人民久已渴望的新生現在开始了。全国各族人民都为这个胜利欢欣鼓舞。但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特别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不仅对西藏叛乱的发生进行了策动，而且在叛乱平息以后，更肆无忌惮地发出許多恶毒的冷箭，公开干涉我国内政，妄图把西藏从我国分裂出去，这是我全国人民坚决不能容許的。遺憾的是：作为中国友人的印度总理尼赫魯，4月27日、5月4日在印度人民院和联邦院分別做了长篇的对中国极不友好的講話。他的講話显然是顛倒黑白、抹杀真理，为印度扩张

真理不容抹杀

· 王其成 ·

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誹謗性的言行进行无理的辯解。我們說：真理不容抹杀，謊言遮不住事实。

尼赫魯先生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干涉和挑衅說成是“實質上不是政治性的”，是“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是“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真是奇怪的邏輯，荒誕的謬論。

印度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在3月29日的談話公然否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把中国西藏地方說成是“国家”。根据4月13日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人民社会党大多数領袖認為，西藏事件是所謂“对中国殖民主义进行的民族斗争”。印度人民社会党的总書記、国民議員戈拉伊說：“小心提防喚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

分子們污蔑中国是一扩张主义国家”，“中国威胁了印度的边境”，并疯狂地叫“組織志願軍到西藏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爭取自由的战斗”。就連尼赫魯自己也亲口說过：“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諸如此类的梦囈和歇斯底里的狂叫还不是政治性的問題么？西藏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七世紀时，西藏就和中国发生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到了十三世紀的时候，西藏就成为中国元朝版图以內的一个行政区域，从此西藏一直就是中国的領土，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什么独立国家，而是統一的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人民公認的事实。过去的西藏地方政府，从未具有国家政府的性質，仅仅是一个地区行政机构，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上平息叛乱，这本是天經地义的中国內政問題，“侵略”，“扩张”何談之有？“威胁”又从何說起？問題非常明显，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以这样故弄玄虛，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視听，制造反华逆流和紧张局势，以便粗暴地干涉我国內政。試問尼赫魯先生这些問題不是政治性的么？再問“印度支援西藏委员会”是什么性質的組織？这个委员会竟宣布“西藏应该是一个独立国家”，又是什么性質的問題？印度报纸叫囂：印度、西藏、中国三方面圓桌會議，印度外交官員散发政治性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是什么性質的企图？印度人民社会党党魁梅达3月29日在孟买的所謂“西藏日”的集会上公然說：“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又說：“西藏問題是影响印度的血肉問題”。請問，印度和西藏什么时候形成的“母子关系”和“血肉問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孟买公开污辱我們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象，激起了我們全国人民的无比憤怒，这种对六亿人民的严重挑衅，也能說成是非政治性的么？事实不容歪曲。

尼赫魯把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粗暴干涉我國的內政的言行說成是“基於情感和入道”是“基於同西藏人民久遠的宗教……親密感情”，這是奇怪言論。西藏95%的廣大人民在反動的、殘酷的農奴制度下過着暗無天日人間地獄的生活，為什麼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只字不提，而在西藏人民開始走上新生繁榮的時候表示如喪考妣的悲痛？當少數窮凶極惡的叛匪向西藏人民大肆燒殺搶掠奸污尼姑的時候不喚“悲劇”，在西藏大農奴主剝下農奴的眼睛和心臟的時候不向農奴主要求“溫和和入道”而偏偏在匪巢復滅的時候，大喚“入道”呢？事情很清楚，印度擴張主義分子不是同情西藏人民，是假借西藏人民之名，而實質是同情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壓迫者、殘殺者——一小撮叛亂分子。很顯明，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就是反動的大農奴主的衛士，根本是西藏人民的自由解放的敵人。

所謂“宗教感情”更是荒誕之至，是帝國主義假借宗教形式干涉我國內政的慣技。那些根本不關心自己國家佛教的印度干涉者，現在突然關心起西藏的佛教，豈不是怪事！當西藏的寺廟作為披着袈裟豺狼的叛亂基地，西藏的尼姑被群魔污辱的時候，為什麼不叫喚“宗教感情”，而在叛亂分子被清除了以後，便又為他們的處境表示“宗教情感”呢？這種所謂“宗教感情”倒不如說是夢想繼承英帝國主義過去在西藏種種特權的感情。法國帝國主義不是也曾利用保護天主教的名義，向我國進行了殘酷的侵略掠奪么？這些慘痛的教訓仍記憶猶新。美帝國主義的寵兒梵蒂岡一貫假借宗教名義干涉我國內政，現在，對西藏叛亂事件，它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叫囂：“是一次新的匈牙利事件，只是其規模更大而已”，又說，西藏叛亂的發生是“有着深刻的根源和共同的基础：基本權利受到損害的人類天性”，又說：“基督教各派在意識形態上堅決反對共產主義，

事实真相不容歪曲，

我們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

——李維光、胡文耀代表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各位代表：

我們對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李富春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彭真副委員長所作的各項報告，完全同意，並衷心擁護。

一九五八年確是不平凡的

一年，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光輝照徹了我們偉大祖國城鄉的每個角落，照亮了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的內心，化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事業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就。

伊斯蘭和亞洲的各個宗教也向它宣布了聖戰。”梵蒂岡又一次地暴露了敵視新中國假借宗教名義干涉我國內政的殖民嘴臉。它這顛倒黑白的無恥謊言和貫于造謠誹謗的美國杜勒斯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的惡毒言行前後如出一轍，這就是所謂“宗教感情”的實質。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我全國人民大家庭的組成部分。中國在自己的領土上平息叛亂，純粹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人不得干涉。我們一向遵重中印友誼，遵守五項原則，決不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但是我們也決不許任何外國勢力用任何形式假借任何名義干涉我國內政。正告一切反動派：帝國主義騎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任意欺侮的時代已

我国内政不容干涉！

全国人民都以无比的兴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从事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年就走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年或几十年的路程。这样惊人的速度，豪迈的气魄，不但振奋着全国各族人民，而且也博得了世界上对我友好的各国人民的称赞。特别自去年八月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后，使我们更具体、更清楚地看到了祖国的

美好远景。我们深为这个伟大的美好远景所教育和鼓舞。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将导致人民走上美满幸福的道路，而且还要以新的道德标准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使我们成为最文明最高尚的人。这完全符合六亿多人民的利益，包括我们中国三百万天主教徒的利益。为此，衷心拥护党的领

导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站立起来了，任何分裂我国的企图，都必将遭到彻底的可耻失败。

我们中国的天主教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梵蒂冈支持西藏叛匪敌视我国的罪恶阴谋。我们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革命警惕，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揭发批判梵蒂冈殖民主义的醜恶面目，彻底摆脱它的一切控制。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和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以生产中的优异成绩粉碎外国干涉者、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梵蒂冈的无耻阴谋，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贡献我们所有力量。

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为生活在祖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但是我们祖国的统一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极端仇恨的。最近西藏叛乱事件，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企图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保存西藏落后、残酷的农奴制度，竟然纠集乱匪，发动武装叛乱，严重地违反了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利益。政府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平息叛乱，是英明而又及时的措施，是全国人民和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因而西藏叛乱迅速平息下来，敌人的阴谋不仅没有得逞，反而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加速了西藏民族地方自治和民主改革的实现。这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

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在西藏叛乱遭到可耻的失败后，哀鸣之余，竟诬蔑我政府平息叛乱为“摧毁宗教”，而一贯追随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梵蒂冈，却把这次叛乱的根源说成是“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的人类天性”。真是无耻谰言。

事实证明，新中国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一贯受到法律保护。宪法第八十八条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毛主席在1952年接见西藏致敬团时就曾明白的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中央和各級人民政府也都認真貫徹了这一政策。解放十年来，中国各宗教界人士和全国人民一

样，在政治上享受着同等的权利，中国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徒被选为全国和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参加全国和各級地方政协委员会的有数百人。在政府机关、学校和各行业中工作的教徒，有不少担负着领导职务，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受到歧视。信仰其他宗教的也是一样。从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来说，我们的代表有信教的，有不信教的，有信天主教的，有信基督教的，有信佛教的，有信伊斯兰教的，但我们都和衷共济，聚集一堂，商讨国家大事。这不充分证明了，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吗？从宗教信仰来说，凡是正当的宗教生活，都受到了保护。全国各地的经堂寺庙不仅敞着大门任人出入，宗教生活从未间断。我们深深感到在新中国享受着真正的信仰自由。

帝国主义和梵蒂冈国外反动派施展它混淆政治与宗教的

惯技，企图迷惑欺骗宗教信徒，西藏叛乱分子的罪行就打了它们的嘴巴，西藏叛乱分子公开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并向我驻拉萨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他们杀害喇嘛，轮奸僧尼，搶劫烧毁寺庙，掳掠残害藏族人民，无法无天，这才真是摧毁宗教，损害天性的罪行。这些叛匪不仅是祖国的叛徒，也是宗教界的败类。我国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正是为了清除这批叛国祸教的匪徒。而我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平息叛乱中，仍然贯彻了尊重群众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宗教政策。既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也保护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帝国主义、梵蒂冈和国外反动派，竟颠倒黑白，把叛匪们的罪行看成是维护宗教，诬蔑我平息叛乱的正义行动是“摧毁宗教”。这确是对宗教极端的嘲笑和侮辱，也是对我国宗教政策的诬蔑。我们坚决

反对这种恶毒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破坏我国统一和各族各界人民团结的卑鄙言行。特别是一小撮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狂妄地叫嚣，露骨地为叛乱分子撑腰，进行企图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容忍的。

帝国主义和梵蒂冈，企图破坏中国的统一和破坏中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团结是一贯的。在西藏叛乱事件之前，战犯于斌即奉了美帝国主义和梵蒂冈的意旨，前去台湾进行反动破坏活动。于斌一到台湾，就冒充着南京教区的总主教，打着“旅行”、“講演”、“訪問”的招牌。在宗教的幌子掩飾下，为美帝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妄想把中国的領土台湾长期置于美国控制之下。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台

湾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解放台湾、澎湖、金門、馬祖。台湾地区的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必须撤走。任何割裂中国領土，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許的。

我们中国天主教徒一定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反帝爱国运动贯彻到底，彻底摆脱梵蒂冈的一切反动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任务。我们深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来自帝国主义和梵蒂冈的阴谋詭計。我们力争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贡献出更多更大的力量，并愿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宏伟计划，为迎接我们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奋勇前进。

(1959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天津市神長、教友到望海樓朝聖

天津市神長、教友于5月10日到望海樓聖母榮勝堂庆賀聖母中华之后瞻礼。天津教区特邀請保定教区王其威主教在早九点举行大礼弥撒，是日晚天津教区李德培付主教作大礼弥撒，参与敬礼的教友絡繹不絕。

是可忍，孰不可忍！

——皮漱石、董文隆、楊士达、王文成和張家樹委員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我們完全同意并衷心擁護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李富春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彭真副委員長、李維漢副主席所作的各項報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二屆第三次會議到現在將近二年了。二年來，無論就世界說，或者就中國說，都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就世界說，總的趨勢是東風壓倒了西風。帝國主義由於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的衝擊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正在一天天爛下去；而社會主義世界則是生產躍進、威望日高、空前團結，一天天好起來。這種形勢大大鼓勵了全世界一切愛好

和平的、爭取自由的人們。

就中國來說，1958年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具有決定性和最光榮的一年。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由於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由於總路線的光輝照耀，由於全民整風運動的勝利，由於六億多人民的英勇奮鬥和創造性的勞動，由於蘇聯和兄弟國家的豐富經驗和無私的援助，在各個戰線上都取得了燦爛輝煌的勝利，出現了一片繁榮昌盛、令人歡欣鼓舞的景象。

我國1958年的工農業大躍進，給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躍進奠定了基礎。事實證明，社會主義道路是唯一能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道路，是使六億多中國人民（包括我

們三百万天主教友) 走向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的光明大道。历史証明只有共产党才能領導我們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它是真正爱人民的,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好的社会制度, 这样好的領導, 我們怎么能不拥护呢? 因此, 广大的神职人員和教友, 莫不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領導,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 羅馬教廷一貫为殖民主义者服务, 反对社会主义, 采取敌視新中国的态度, 它多方破坏和阻撓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員和教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事实証明, 羅馬教廷不仅在我国解放前长期利用中国天主教为殖民主义者服务, 而且在解放后仍然力图繼續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工具。

羅馬教廷与帝国主义者勾結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事例很多。举其要者, 如:

1931年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 制造了伪滿洲国后, 羅馬教廷首先予以承認, 委派了法帝国主义分子高德惠, 为教廷駐伪滿洲国代表, 并发出“布告”、“命令”, 要天主教友拥护伪滿洲国, 为伪滿洲国祈祷, 拥护大东亚共荣圈。

1937年7月,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当着中国人民进行英勇抗战的岁月里, 羅馬教廷却指示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支持日本行动, 要中国各教区主教、神父, 实行中日亲善, 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巩固它在占領地区的統治。

1946年12月, 羅馬教廷派黎培里为“駐华公使”, 协助蔣介石发动內战。黎培里到南京后, 就号召中国天主教友要集中力量与国民党政府密切联系。并乘美国軍用专机亲自到东北、华北等地, 帮助蔣介石的反人民战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黎培里因繼續进行間諜破坏活动，策划建立反动組織“圣母軍”，企图顛复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罪行，被中国人民驅逐出境，羅馬教廷仍派他到台湾去作蔣介石集团的“公使”，繼續进行破坏新中国的活动。

不仅如此，羅馬教廷还利用宗教指示暗藏在中國天主教會內，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不断地以“通諭”、“命令”来煽动中国天主教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不准教友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組織，强令教友为实现它的反动政治阴谋“流血致命”。甚至以所謂“叛教”、“裂教”的罪名，和“摘神权”、“停神功”、“弃絕”（开除教籍）等手段来威胁打击爱国的神职人員和教友。近来并与杜勒斯相呼应，对我国人民公社和1958年全民全面大跃进，进行造謠誣蔑。

此外，羅馬教廷于1957年3月和7月两次无理否認了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全国政协委员）。又于1958年3月否認了汉口、武昌两教区的主教合法选举，并以“超級絕罰”施行恫吓，企图使这些教区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以实现它繼續利用中国天主教會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最近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仍复追随美帝国主义，发表无耻謠言，美帝国主义把我国政府討伐国家叛徒、民族罪人、宗教敗类的正义措施，說成是“摧毀宗教”；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羅馬教廷也把我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說成是“基本权利受到損害的人类天性”。而繼承英帝国主义衣鉢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企图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实行其扩张野心，把我国神圣領土西藏，置于印度的控制之下，把西藏人民再拖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痴人作梦的狂妄想

法。最近以来，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把我国人民严格遵守“五项原则”、睦邻友好的诚挚态度，认为是软弱可欺。他们更热昏了头脑，不顾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和反对，变本加厉的疯狂叫嚣，对我国百般诋毁和诬蔑，甚至组织“示威游行”侮辱我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象。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严正地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中国的神圣统一，是决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加以破坏的。想在西藏问题上討点“便宜”，是绝对办不到的。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胆敢侵略西藏的阴谋，一定会在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铁拳下被打得粉碎。

中国天主教三百万教友，坚决拥护政府命令解散策划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英明措施，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罗马教廷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这种恶毒的利用宗教和西藏叛乱事件，干涉我国内政

的卑鄙手段。我们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平息叛乱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欢呼，我们为祖国统一的更加巩固和西藏人民的获得新生而庆幸。

罗马教廷利用宗教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种种阴谋破坏活动，不仅不能欺騙我们觉悟了的中国天主教友，和动摇我们反帝爱国的立场，反而使我们更加擦亮了眼睛，坚定了斗志，进一步认识到罗马教廷的反动本质，认识到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也更加看清了：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尊严和六亿多人民的利益，中国天主教会必须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一切控制，坚决彻底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任务。

我们中国三百万天主教友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宏伟的跃进计划贡献出一切力量，并为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或更多一

反对借宗教感情为名干涉

我国内政

——楊士达委員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我对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位首长的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并完全同意李維汉副主席作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我們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断飞跃地向繁荣、富强、幸福的道路上前进。在1958年，我国第二个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出現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更大大地鼓

些時間，把我国建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們相信，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

舞了全国人民的干劲。上海天主教界和全国人民一起，也跟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前进中，特別在1958年也出現了一个大跃进，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門戶，各国传教士在上海都建立有侵略据点，进行房地产及証券的投机勾当，成为上海最大的地主。因此，在上海天主教界中依靠帝国主义起家的

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紧密团結共同努力下，定会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原載1959年4月27日

人民日报)

买办地主特别多，他們都具有浓厚的“洋奴”思想：只崇拜洋人，不爱祖国；尊敬教皇超过自己国家元首，他們認為教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外国传教士是教皇派来的，尊敬外国传教士就等于尊敬教皇，这种盲目的崇拜心理，在神职人員中（包括修女），尤为显著。那些反革命分子如龔品梅之流，更是死心塌地的供帝国主义驅使，甘心情願地进行叛国的罪恶活动。

1953年和1955年，上海天主教界开展了反帝和肃反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反帝爱国的道路上，大大跨进了一步。

为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精神，上海天主教界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上海市十六个区(县)有五千多教友，一千五百多天主教青年，三百多修女以及全体神父共約七千多人参加了学习。通过摆事实，講道理，揭穿了羅馬教廷的反

动面目，粉碎了它的残余爪牙的猖狂进攻。在事实面前，他們現在也已經看清楚了羅馬教廷彻头彻尾是帝国主义的工貝，一貫利用宗教形式来达到反动政治目的，每一个宗教性的措施如：“通諭”，“特殊禱”，“日課經”……都包含有反动政治的意义，借此以干涉我国的內政，阻碍我国教友爱自己的祖国，迫使中国天主教会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这就使上海天主教界更加看透羅馬教廷的凶恶面目，坚决彻底摆脱它的反动控制，向它斗争到底。它的阴谋破坏遭到了上海天主教友坚决的回击，我們上海教友紛紛签名抗議声討羅馬教友支持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

对羅馬教廷潛伏在上海的一小撮残余爪牙，上海天主教友同样向他們开展坚决的斗争。数以千計的辯論大会上，許多曾受过他們欺騙，毒害和被利用的教友揭发了他們进行破坏活动的罪恶。在辯論会

上，教友群众还根据亲身经历的事实，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身受的痛苦，解放后亲身受到的好处，把这些罗马教廷残余爪牙驳得口张舌结，理屈词穷，完全孤立。许多修女也愤怒地揭发控诉帝国主义迫害中国修女，以毒害、欺騙、利用她们进行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事实又一次教育了大家，天主教内部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与宗教根本没有共同之点，他们不仅危害了祖国人民的利益，也危害了广大教友切身利益，他们口口声声所谓“宗教”，为“宗教利益”，不过是用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幌子罢了。正如许多教友们说的：现在我们的眼睛亮了，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

繼反帝肃反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上海市天主教界进一步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一致拥护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许多教友解决了过去未解决的，束縛自己前进

的罗马教廷问题之后，真好比身上丢掉了一个大包袱，觉得今后可以轻装前进了。这对上海天主教界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老根在上海天主教界中已基本上拔除了。现在上海市已有十六个市（县）的教友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爱国组织——爱国会，有的提出了决心书，保证书，有的通过了决议和爱国公约，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分力量。有的女教友过去任何爱国活动、社会活动都不参加的，现在积极参加；有的还出来担任食堂、托儿所等社会福利工作；有的参加了生产组和修筑公路的劳动。有的天主教青年过去工作、生活、学习老是悲观消沉，现在也积极起来了，象有一个傅兰珍教友学习后回到厂里成为织布能手。他们觉得过去正是罗马教廷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欺騙毒害，与各界青年距离得

很远，因此今天更为痛恨罗马教廷，更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去。神父修女们的爱国觉悟和政治认识也有显著的提高。如神父们签订了爱国公约和作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劳动锻炼，改变过去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要适应国家不断发展的形势，在不妨害生产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宗教生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在各界人民的支持帮助下，上海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又一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我们知道，这仅仅是个开端，要再接再厉继续不断地前进。

我们天主教友完全拥护国务院彻底平息西藏叛乱的英明措施。西藏上层叛国集团是受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指使的。这些叛匪无恶不作，严重危害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利益，为国法所不容。现在西

藏上层叛国集团的阴谋已被迅速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竟卑鄙无耻地借宗教为名，进行污蔑挑拨，说什么我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是“摧毁宗教”。我们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谴责并抗议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无耻谎言。我们根据亲身的经历，特郑重地指出：**在我们中国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才是真正摧毁了宗教。**在这方面，我们天主教友的体会特别深刻，我们自己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大量罪恶。让帝国主义在那里无耻地叫嚣吧！他的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同时，我要正告印度的扩张主义者不要借什么宗教感情为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摘自 1959 年 5 月 2 日

人民日报）

各地神长、教友：如订阅本刊，请直接向天津和平区西宁道九号广扬月刊发行课联系。

本刊启

尼赫魯的講話漏洞百出不能自圓其說

蕪湖市神父 王 達

我完全同意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並為貫徹這個決議而奮鬥。

印度總理尼赫魯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勢問題發表了講話，雖然用了一些動聽的詞句，說了一些漂亮話，但無論怎樣花言巧語，文過飾非，也掩蓋不了干涉我國內政支持西藏叛亂分子，為印度擴張主義分子辯解的真相。

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劫持達賴喇嘛到達印度穆索里，尼赫魯“為他們的居留作了安排”。把慘酷剝削、血腥統治西藏人民的反動分子說成是“無依無靠”的“難民”，尼赫魯作他們的靠山，收留他們支持他們叛亂。同時又為反

動分子開脫罪責說：“如果說這完全由西藏若干上層反動分子負責，看來這種說法是把一種複雜的情況異乎尋常的簡單化了”。我們說西藏叛亂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陰謀策劃而發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下令解散原西藏政府，解放軍駐西藏部隊迅速平息了西藏叛亂，保衛了祖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使西藏人民獲得了新生。我國各族人民莫不歡欣鼓舞，世界上正義人士包括印度的廣大人民在內都在為西藏人民慶幸。但是尼赫魯却認為是“悲劇”，他所以這樣做是基於“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宗教文化”的聯系，這種謊言是掩蓋不了事實的。正如班禪額爾德尼所說：印度佛

教受到摧殘，寺院破烂不堪、佛象东倒西歪，破鼻烂眼，缺臂少足，尼赫魯并没有睬理过。而西藏人民在党的宗教政策的保护下，得到了真正的信仰自由，举行着自由愉快的宗教活动。尼赫魯却歪曲誣蔑，提出什么“宗教感情”！西藏广大人民长期受着农奴主惨酷剝削、血腥压榨、遭受着割鼻、割耳、割手、割膝盖、抽筋、挖眼、釘竹籤、削发、烙刑、刺心肺、点天灯、剥人皮……等惨无人道、灭絕人性的折磨，尼赫魯从未表示过絲毫同情，請問尼赫魯先生的“人道”那儿去了呢？現在西藏一小撮子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很快得到平息，极惨酷的农奴制度受到广大西藏人民的反击，很快就要消灭，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侵略阴谋不能得逞，尼赫魯就道貌岸然地叫嚷起“人道”和“同情”了！很明显，这种同情是政治性的同情，是接受英帝国主义衣鉢的情感，对西藏施行扩张

的情感，对农奴主的情感。这是我們决对不能容忍的。我們为了维护祖国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要与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分子坚决斗争到底。

我們要繼續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影响，特别要与梵蒂岡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梵蒂岡利用宗教进行的政治阴谋活动。梵蒂岡对西藏叛乱的态度同帝国主义者一样，并狂妄叫囂，表示支持和鼓励，說什么“西藏叛乱事件是新的匈牙利事件，只是規模更大而已。”又誹謗地說：“西藏叛乱事件的发生是有着深刻的根源和共同基础，基本权利受到損害的人类天性”等无耻謾言。我們一定要粉碎这种卑鄙誹謗，决不容許这种侵略阴谋得逞，并以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实际行动給帝国主义者和羅馬教廷以有力的回击。

我國內政不容干涉

北京南堂本堂神父李蔭桃

自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結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发动武装叛乱以后，国务院明令平息叛乱，这本是中国內政問題，外人无权干涉。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疯狂地向中国进行誣蔑，干涉中国內政，这是我們坚决不能容忍的。更令人遺憾的是，尼赫魯先生身为印度总理，对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损伤中印两国友誼和破坏五項原則的罪恶言行，不仅不予以严厉譴責，反而顛倒黑白地进行无理辯解。

尼赫魯关于中国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譴責，說是“沒有根据的”，“不公正的”。对于扩张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行“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感情”。那末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曾把西藏說成是一个“国家”，还有人叫嚷什么“西藏独立”，并且要組織什么“志願軍”到西藏去……，这些不

是政治性的么？尼赫魯先生不願事实真相，煞費苦心地替他們开脫罪責，居心何在？

被压迫的110多万西藏人民正在欢喜若狂地庆祝他們从千百年苦痛深渊中解放了出来，反动的、黑暗的农奴制度已告結束，西藏人民开始了民主的新生，这是一件大喜事。但尼赫魯先生却把这种好事說成是“悲剧”。請問尼赫魯先生究竟在替誰說話？尼赫魯想用謊言把政治性的干涉責任輕輕推开，而硬說甚么对于西藏叛乱分子的同情是“基于宗教感情”。但这是欺騙不了人任何的。

我国政府对于宗教問題，一向采取信仰自由政策。和平解放西藏后，解放軍和政府进入西藏的工作人员切实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办

尼赫魯不該顛倒黑白

獻县教区付主教馬光普

話中說：“這些不愉快的事態發展的消息（指西藏暴亂被平息的喜訊）傳到印度來的時候，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勾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背叛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武装叛乱，已經迅速平息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国西藏問題的无耻叫囂，受到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正义譴責。与此同时，印度总理尼赫魯先生一方面提出“中印友好”，另一方面一再发出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异曲同工の濫調，使我們感到十分遺憾。

尼赫魯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勢发表的談

事，完全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是我全国各族人民和宗教界所亲身体驗到的。現在事实証明：破坏民族团结的是西藏少数敗类，破坏宗教的是衣冠禽兽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叛匪，他們搗毀了佛

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實質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試問，逃到印度去的一小撮西藏叛乱分子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們是勾結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破坏国家統一的叛徒，为六亿人民所不容；而尼赫魯先生却把他們說成是“难民”，說什么不能讓这些“难民”无依无靠，甚至对这一小撮叛乱分子給以“人道”

象寺庙，并以寺庙做叛乱的据点，尼赫魯先生却不顧事实真相地說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污蔑中国的言行是“基于宗教感情”，岂不是顛倒是非，欺人之談！

的同情；但是对走向幸福新生的西藏广大人民却說成发生着“悲剧”。請問，这种同情是出于“人道”？尼赫魯先生对那些杀人放火，奸盜邪淫，万恶滔天的叛匪，給予妥善安置，并供給他們生活資料；相反却把西藏一百一十万人摆脫农奴枷鎖，开始度着新生活說成是“悲剧”。尼赫魯这样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若不因神經錯乱，定是別有用心。

为什么尼赫魯先生这样同情那一小撮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呢？根据尼赫魯在同一发言中說“是維護印度的安全和完整”，似乎我們平定西藏叛乱，使印度的安全受到“威胁”，真是瀾天大謊。西藏是中国的領土，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与印度的安全和完整有何相干？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干涉任何国家的

内政，更沒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相反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国的西藏問題却很感兴趣，积极支援叛匪，叫囂什么“西藏独立”，甚至要想派“志願軍”到西藏反对西藏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試問，这与尼赫魯先生的“我們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們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間的友誼”的說法，有甚么共同之处呢？

最近，美国参議員肯尼迪5月2日晚在北加利福尼亚世界事务委员会講話时說：“西方国家必須以每年十亿美元的投資来支持印度同中国进行“竞赛”，要不然，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的抗衡者的作用便将失去，共产主义将贏得它最大的不流血的胜利。”人們不禁怀疑：尼赫魯先生正向“作为共产党中国的抗衡者”的道路上发展。



欺侮中国人民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全体工作人员

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

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已被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公正舆论驳斥得体无完肤。而这伙被英帝国主义豢养起来的西藏叛国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鉴于自己的马脚毕露，为了企图摆脱窘境，便又假借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了第二个声明，但假的到底是假的，不管怎样抵赖和巧辩，总是抹杀不了事实的。我们要问：为什么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早已翻译和印成英文本而且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呢？是“达赖喇嘛的声明”，为什么既么声明中的内容同达赖喇嘛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文章和许多谈话完全相反？尼赫鲁派往迎接达赖喇嘛的特使梅农在答复记者追问时，还假惺

惺地厚颜无耻的说什么第三人称“可能是传统的西藏形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西藏全体僧俗人民谁也不用这个传统形式，而达赖喇嘛在过去八年中不拘谈话和写文章，也从未用过这个“传统的西藏形式”呢？为什么达赖喇嘛只在第一个所谓声明用“传统的西藏形式”，这究竟是誰的传统形式呢？

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原形被人们识破之后，22日印度外交官员梅农匆忙的发表谈话，硬说“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是“西藏人自己翻译的”，其他人不能对这个声明负责”。大家看，这是做贼心虚，做了不光采的事，还不想当不光采的角色，那怎么成呢？

令人更为憤慨的是，最近以来，印度政府縱容扩张主义者更加猖狂的組織“示威游行”，在我国領事館門前进行騷扰，对我国大肆誣蔑，更恶毒的是侮辱我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象。我們認为印度扩张主义者对我国人民的挑衅行为，已疯狂到极点，中国人民已忍无可忍。我們严正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中国人民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西藏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息叛乱是中国的內政，中国人民不干涉別国的內政，但也决不允許別国干涉我国的內政。任何企图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破坏我国統一，实现扩张野心的可恥阴謀，必然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沉重回击。

(原載1959年4月27日
人民日报)

全国各地神修人員和教友

紛紛集会討論尼赫魯講話

出席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的代表李維光主教、胡文耀先生，和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會議的委員皮漱石主教、楊士达先生、董文隆主教、王文成主教、张家树神父等，于4月30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进行座談，除彼此交流了参加會議的感想外，并就西藏問題发表了意見。代表和委員們对西藏叛乱分子的罪行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粗暴地干涉我国內政以及尼赫魯歪曲事实的談話表示极大憤慨。大家一致拥护政府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英明措施。李維光主教說：“西藏社会制度是那样黑暗落后，残酷反动，而上层反动分子又是那样残忍野蛮，任意用

割鼻子、割耳朵、抽脚筋、割手、挖眼、掏心、活剥皮、点人灯等非刑残杀西藏劳动人民，而且把杀害了的劳动人民的头骨做成饭碗吃饭，做成法鼓、佛珠，供祷告使用，把人皮做成法鞭来打人，把人肉做成“神药”，把无辜青年男女的腿骨做成“吸鬼筒”来欺骗人民。不仅没有一点宗教气味，简直畜类不如。这样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决不容许存在下去的。反动喇嘛也好，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决不能阻止我们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利用宗教，利用清规戒律，绝不能阻止社会主义建设。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都要拿掉。因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些障碍都是害人的，是直接危害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的，是违反天主圣意的，是罪恶的。杨士达先生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涉。我们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收回它们的猪咀，中国

美丽的园地，绝不许它们置喙。它们热昏了的头脑，应该冷静冷静了”。代表委员们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最近竟然歪曲事实真相，连续发表谈话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作辩护感到十分遗憾。尼赫鲁口口声声要“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要奉行“五项原则”，而在西藏问题上却纵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兴风作浪，破坏中国统一，把他们积极支持西藏叛乱分子，鼓动西藏“独立”的阴谋，说成是“人道”、“宗教感情”；把攻击我人民政府平息叛乱的庄严命令和侮辱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的暴行说成是“偶尔失去节制”和“不礼貌”，而且借口“西藏人不同于汉人”，来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胡文耀先生说：“尼赫鲁失去了理智。印度也有不少民族，而且种性也不止一个，难道都应该独立吗”？代表和委员们愤怒地指出尼赫鲁这样同情骑在西藏人民头上的上层叛乱分子，而对

受尽蹂躪的西藏人民就沒有寄与絲毫同情，这就是最不人道的。同时也更令人怀疑他所說的“宗教感情”又是什么样的“宗教感情”？代表和委員們一致表示，贊同班禪喇嘛在政协会議閉幕时的講話，“西藏問題只在中国解决，决不能到任何外国去解决”，也决不容許任何外国人来橫加干涉。我們始終奉行和平共处五項原則，但絕不容許別人利用五項原則来欺侮中国。

(中国爱国会供稿)

天津市全体神职人員，全体修生和仁爱会、方济格会、若瑟会的全体修女以及在飞跃塑料厂和衛星縫紉厂参加工作的男女教友于5月8日集会認真討論了尼赫魯在印度人民院和5月4日在联邦院的講話。

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委李德培付主教在会上譴責了外国干涉者的种种无耻謾言时指出：西藏是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西藏問題是

中国內政問題，决不容許外国人干涉，印度某些扩张主义分子繼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衣鉢，支持西藏反动集团叛乱，叫囂所謂“西藏独立”等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損害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誼，不能不引起我国广大天主教徒的极大憤怒。遺憾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魯先生不顧事实真相，硬把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說成是“民族主义情緒”，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戡乱說成是“悲剧”。那么我們請問尼赫魯，西藏人民身受农奴主几千年的野蛮統治——挖眼、剝皮、割手断足等駭人听聞的残酷刑法却是喜剧么？宋乐山神父发言說：自人民解放军迅速地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后，从我国西方刮起了一股反共反华的妖风，大嚷大叫，竭力支持西藏叛国集团的武装叛乱，誣蔑我国平息自己領土上叛乱是什么“侵略”等等。我感到惊异的是，尼赫魯先生对西藏叛匪的

失敗也“感到难过”并給以“同情”。尼赫魯这种阴謀詭計，假冒人道之名，来同情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残杀者，西藏吃人的制度的匪酋，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阴謀辯解。这种对我国极不友好的态度，我們給以严正指責是非常必要的。仁爱会修女院院长吳仲芳修女說：我国政府責令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乱，是符合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也是极符合西藏同胞的切身利益的英明措施。然而，印度的少数扩张主义分子却十分囂张地公然对我国内政进行粗野的干涉，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憤怒，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糾集一批暴徒，公然侮辱我国伟大領袖毛主席象，尼赫魯把这严重事件說成“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这是我們絕不能容忍的，我要正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們，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我們有力量击退一切侵略者！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馬光普

付主教、苏长安修女等。天津教区张济长付主教、神哲学院院长王洗耳神父等也作了書面发言。

又訊，天津市部分青年教友和修生于“五四”青年节这天，和全市各族各界青年一齐集会，对尼赫魯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进行了全面的討論。大家一致指出，尼赫魯的講話是歪曲了事实真象的。并認為，西藏問題純屬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并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国内政的粗野干涉和公然破坏五項原則的阴謀表示极大憤慨。

洛阳教区总堂主教、神父、修女及教友于5月4—5日間分別集会討論关于尼赫魯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講話。到会人員一致指責尼赫魯誣蔑我国人民平息西藏叛乱是“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着悲剧”和公开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做辯护的无理行为。

保定市天主教界和基督教界人士于5月4日討論了印度

总理尼赫魯的講話。师如在付主教說：尼赫魯的講話是以不干涉中国內政之名达到干涉中国內之实，他希望中国不去平息西藏叛乱，可任西藏叛乱分子为所欲为，这不是干涉中国內政又是什么呢？李道宁付主教說：尼赫魯說西藏发生了“悲剧”，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别有用心。西藏人民平息了这次叛乱，結束了残酷黑暗的統治时期，这是天大的喜事。

此外，侯景雨、賈文質、侯洪文神父相繼用大量事实駁斥了尼赫魯的种种謬論。

(安风璞)

张家口市神职人員，修女和教友于5月4日仔細研究了印度总理尼赫魯的講話，一致指出：尼赫魯歪曲了西藏叛乱事件的真象，并为印度扩张主义者进行辯护，干涉我国內政。座談会持續了4个小时。

(张市爱国会供稿)

全国青联三届委员会二次會議召开 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有天主教8人

全国青联三届委员会二次會議于4月30日至5月6日在首都北京召开。出席委员会的天主教人士有：徐振江（辽宁省青联付秘書長、沈陽教区付主教）、王达（蕪湖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委，神父）、李毓桂（太原市神父）、刘雅敬（河南省漯河市天主教神父）、舒牧汉（江西南昌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任）、李文駮（女）（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青联組付組長）、岳树德（天津市小营門本堂神父）、孟荣华（北京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付秘書長）等8人。

全国青联常委楊高坚（湖南常德教区主教）刘柏年（青島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任，市青联付秘書長），因事請假，未出席會議。

讓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哭泣吧！

—参加天津市“五一”观礼感言

· 赵振声 ·

伟大的1959年“五一”劳动节的清晨，我应党和政府之邀，与王其威主教一道荣幸地登上了天津市观礼台，内心激起无限感激和兴奋的浪花。

这天早晨从9点钟开始，天津市十几万人的示威游行队

伍，雄壮地通过观礼台，接受了河北省和天津市首长的检阅。参加游行的各族各界和各个机关团体的群众，有的手执花束，有的高举花环，有的抬着表示生产指标直线上升的图表和各种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



在“五一”观礼台上（中排左第一人为保定教区王其威主教，第二人为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

牌，并高呼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策动的西藏叛乱，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粉碎外国干涉者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工人、农民、商业工作者、医务界、文艺界、宗教界和学生們，浩浩盪盪，万馬奔騰。他們一致欢庆祖国大跃进的成就并决心实现新的、更大的跃进。

建国仅仅十年的工夫，我們祖国和人民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使我感到万分兴奋，心情激动之余，我都忘了

我是66岁的人了！

我国伟大的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有党和毛主席，我們的国家必将永远蒸蒸日上，永远象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光芒。讓帝国主义和一贯诬蔑、破坏我国的罗马教廷对着我們的胜利哭泣吧！同时，我衷心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永远服从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越南大批天主教徒参加农业合作社

据越南“人民报”5月5日报道，北越天主教徒最多的南定省，已有一万多戶天主教徒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和变工組。他們占南定省天主教徒总数的28%。

这个省安沙、春和、文里等三个天主教乡，全乡的

教徒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和变工組。

这个省在发展变工合作运动当中，已經培养出四百多名天主教徒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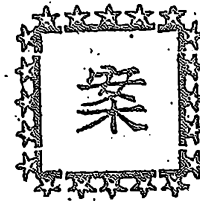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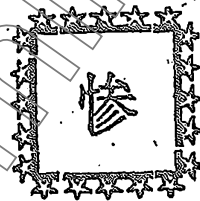
河內天主教友集会

譴責美、吳集团制造富利惨案

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內市的天主教友代表在4月7日晚举行集会，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吳庭艳集团制造富利惨案。

會議宣布不承認吳庭艳是天主教教友，因为他制造了大屠杀案。

會議要求国际委员会及早对富利事件进行调查，使真相大白于世。



富利惨案是在和平时期世界上未曾见过的极其野蛮的一次大屠杀，美帝国主义和吳庭艳集团在南越富利集中营制造屠杀一千多名越南爱国者的血腥罪行，激起了全世界輿論的公憤。

1958年12月1日，富利集中营的劊子手們在飯里下了毒藥，企图一下毒死六千条生命。飯后每个人都痛得呼喊，

打滾和掙扎。当大伙发现中毒后，全营人立即騷动和大声呼救，要求打开獄門給予救治，但是獄警早已接到命令紧鎖牢房，而且派出軍隊在集中营周围严密防范。一部分人爬上屋頂，把屋瓦扔向牢外并大声呼救，竟被他們开枪打死。呼喊声震动了整个地区，一直传到两公里外的老百姓耳中。这时他們向監獄里开枪射击，又打

死了一部分人。只在当天就有一千多人死亡，其余的人也中毒重伤，生命垂危。

幸免荼毒而仍然活着的人，繼續斗争，得到附近居民同胞的大力声援，使南越当局惊慌失措，他們一方面造謠說什么一次死那么多人是由于发

生了疫病，另一方面用毀尸灭迹等手段企图消灭罪証。同时还出动军队镇压人民的斗争。

富利大屠杀惨案，又一次揭穿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吳庭艳政权的法西斯独裁性質。

(原載“信鴿”)

李德培、龐世宏荣任对外文协理事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于4月15日举行常务理事和各有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改选了理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席李德培付主教和宣教部长龐世宏神父当选为理事。

李維光当选中苏友协总会三届理事会理事

中苏友好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于5月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选出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第三届会长、付会长、理事会秘书长和理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席李維光主教当选为理事会理事。

四川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扩大会议結束

出席会议的委员及列席人员

进行了为时50天的学习

四川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于1959年2月21至4月13日在成都市举行。出席会议的委员及列席神职人员与各地爱国会主任共78人。会议期间讨论了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四川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1958年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并通过了大会决议。在会议期间，大家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约请了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首长作了关于学习人民公社问题以及目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参观了工厂和人民公社的卫星田；举办了神职人员劳动生产成品展览。

在政治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收获，认识到1958年大跃进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确贯彻执行的结果，是党领导取得的伟大胜利。

通过学习和讨论，一致认识到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纷纷表示要和全省人民一道，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人民公社。在学习过程中，更加认清了参加劳动生产是进行自我改造的基本途径，同时又是解决神职人员生活来源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学习期间，大家一致肯定几年来人民政府是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政策没有改变。同时

认识到，应该在服从生产的原

則下安排个人的宗教生活。

通过学习，进一步認識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壮大，民族独立运动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力量在迅速增长和发展，帝国主义正如毛主席的英明論断：“一天天烂下去”。

总之，大家認為會議开得

很好，使大家在政治思想覺悟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家一致認為，这主要是有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为了感謝党和政府，今后一定更加鼓足干劲爭上游，为社会主义建設貢獻全部力量。

(罗瑩澄、李嘉俊)

出席人代、政协会議的天主教代表滿意

全国爱国会一年来的工作成績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于4月30日，邀請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會議的委員——該会付主席楊士达、王文成、李維光、董文隆和常务委員张家树、胡文耀等举行座談会，交換了会务工作意見。并由曹道生付主席将一年多来秘書处、联络部、宣教部以及学习、交心、劳动鍛鍊和接待越南天主教訪华代表团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彙报。他們对一年多来的工作，除一致表示滿意外，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見。

羅馬教廷对社会文化和人类知識的

壟断与摧殘

周健鐘

教廷教育極力迫害世俗教育

十二世紀時，歐洲知識界為了打破羅馬教廷對學校教育幾百年來的壟斷，開始在城市設立非教會學校，非教會學校在法國北部特別發達，這些學校在教育計劃和人力物力上完全獨立自主，擺脫羅馬教廷的控制。法國學者伯多祿·阿柏拉在巴黎創辦了不少學校，先在神哲學問題上來反對羅馬教廷的反動權威，不久阿柏拉被教廷殘酷迫害，在1140年的桑斯公會議上定了他的罪，教皇依諾增爵第二焚燬了他的一切著作。

十一世紀末，歐洲第一個非教會的高等學校——波倫亞大學成立，吸引了大批反羅馬教廷的學生。到了十三世紀初期，歐洲的主要城市巴黎、牛津、曼不列、撒利諾、巴勒摩等地建立大學之風盛極一時，其中以巴黎大學為中世紀時期規模完備的、典型的大學，而且具有國際性，這對教廷的反動教育是一個有力的打擊。教廷鑒於這種情況，竭力在城市中大量發展教廷控制的教會學校，與世俗知識界爭奪教育陣地。由於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異常強大的勢力，決定了教廷仍然取得精神方面的統治地位，把許多新興的大學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

十一至十三世紀期間，歐洲反對羅馬教廷的鬥爭，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內。在這方面出現的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派，引起教廷極大的注意，並組織了方濟各會及多明我會來企圖撲滅文化教育界的反封建革命、反對羅馬教廷的鬥爭和消滅人民的“異端運動”。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成立，還替教廷提供了許多反動的神學家，以奪取當時大學的教授地位。教皇亞歷山大第四特別下令保護巴黎大學里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神學家的特權地位，驅逐了反對教廷的教授，從而各大學里的神學系都被擴大並占有首要地位。

（未完待續）

揭露梵蒂岡教廷在拉丁美洲的罪恶活动

·朱世昌·

在荣主教灵的幌子下

显然，这批来到拉丁美洲的吃人的虫豸們所关心根本不是什么傳揚“基督的福音和拯救土人的灵魂，而是享受在本国不能想望的一种权力和道德上的放縱。許多傳教士对于教徒的兴趣主要都放在詐取錢財上，一些較穷苦的印第安人的乡村每年最多只能見到一、二次神父，有的甚至一次也見不到。多数教士和修道院都集中在中央各省。許多女修道院实际上已成为貴族妇女的休养所，她們各自有她的侍候人过着安逸清靜的生活。尽管那些主教、神父也裝得道貌岸然好象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牧羊人，實質上这不过是掩人耳目騙取錢財的一种手法吧了。史学家派克斯就憤怒地鞭撻了这些伪君子的灵魂，他写道：“他們將从15世紀以来逐漸發展而成的一切帮助礼拜的美感和感覺的工具及办法都帶到墨西哥来：圖画和画象，教士們的彩色長袍，

摆动的香爐，音乐以及伴随着弥撒献祭的香烟……在举行聖占礼之日，墨西哥城的街道上列队游行的有3万人，随时不断地提醒人們注意宗教和它的教士們的重要性，一个主教穿着紫袍坐車經過一个城市街道的时候，街上的人都躬身接受他的降福。要將聖体帶到一个临終者的床榻前——先有一个搖鈴，然后一个神父赶着騾子拉的一个車子，然后12个修士拿着蠟燭，唱着聖歌，經過时，沿途群众都必須下跪……每一个教堂里都有一个流血的耶穌象。在这种种鋪張的繁文褥节的仪式之中并没有多少道德的成份，至多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神秘工具；最坏时則是西班牙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⑫这簡直是一幅活活的諷刺画！所以，尽管梵蒂岡的狡猾的宣傳和經濟、政治上的压力，把千百万的印第安人驅来信教，但是，那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逐漸变得聪明起来的印第安人却始終对这些不受

附注：⑫同③ P.88—89

欢迎的“演員”采取了鄙視不屑的态度。布蘭夏德在評論这种情况时說道：“自从天主教的战士們用天主教教皇的名义占領这个地区（拉丁美洲）以来的四百余年期間，羅馬教会未能取得人民大众的信仰，这地区大部分仍然是傳教区”^⑬就連自称为印第安人的“朋友”的耶穌会神父、作家边生和邓恩也不能不發出絕望的嘆息：“冷淡态度是普遍的現象……一般說来，只有極少数的居民参加教会的宗教生活或者履行最低限度的义务”^⑭其实，只要稍为睜开眼睛看一看这些“朋友”們的行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

当时，許多教誨教徒蔑視“現世荣华”的教士都沉溺在无度的奢靡之中，过着花天酒地的淫蕩生活。18世紀末，墨西哥大主教單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的經常收入每年就达13万美元；柏布拉主教的收入是11万美元；瓦拉陀立德主教的收入是10万美元；瓜达拉哈拉主教的收入是9万美元，而許多乡村里的普通神父一年只有墨西哥幣100比索，这个数目只相当于瓦拉陀立德

主教的收入的一千三百分之一。这种情况，再加上他們的放恣淫乱，就不能不遭到部分較有良心的教会人士的反対。就是在今天，梵蒂岡“德政”的义务宣傳員也不能規避这一点，李安神父說：“教会的鉅大财富和财富之輕易获得，必然造成某种程度的懶惰、放恣和道德敗坏”^⑮事实当然要比他所說的严重得不知若干倍。当时，教士寻花探柳蓄妾宿娼似乎已成为一种慣例，許多奇裝異服，油头粉面的修士就公然手挽着妇女招搖过市，就連教会控制下的墨西哥市参議会也不得不在1664年对那些伤風敗俗敲詐勒索的教士們表示斥責。最后，由于搞得不成話，以致引起群众的普遍反感，在社会輿論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迫使一貫把“天主教作为是有天主保护的一种保証与进行掠夺的一种方便借口”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于1767年6月2日破曉前將声名最狠借拥有西半球大片地产和一連串的其他企业的678名耶穌会士从墨西哥全部遣送到委拉克路斯，然后轉送到欧洲。

（未完待續）

⑬布蘭夏德著：美洲人的自由与天主教会权力 P.279 ⑭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綱 P120 ⑮艾德温·利安（神学博士）著：南美各共和国的教会 P.7.



拉薩市軍管會成立后，積極救濟受叛亂分子迫害和由于叛亂失去生活來源的老幼殘廢的市民。這是拉薩軍管會第三工作隊，正在給市民發放救濟糧。

新華社記者 任用昭攝

謊
言
怎
能
掩
蓋
事
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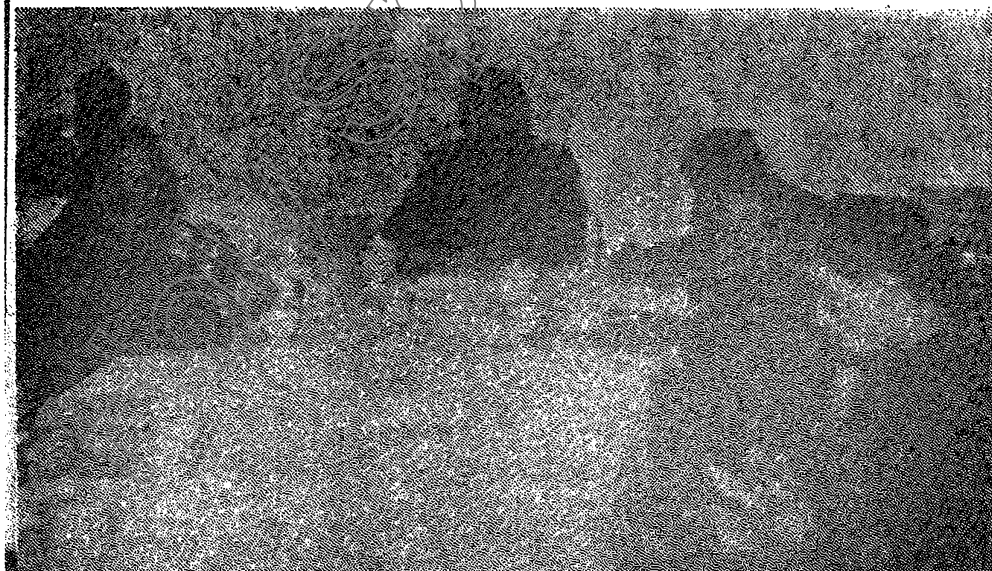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於1956年4月22日宣布成立，三萬多藏、漢、回族人民集會拉薩布達拉宮前的人民廣場歡騰慶祝。

新華社 攝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4月18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宗教界委员们在讨论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左第一人为四川南充教区王文成主教。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